



后代

王愿坚

解放軍文艺丛書編輯部編

· 后 · 代

王 愿 坚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容說明

本書作者王愿坚同志是以擅長描寫革命歷史題材而受到廣大讀者歡迎的一位青年作家。這個集中的“媽媽”、“趕隊”、“後代”和“七根火柴”等九個短篇小說，內容都是描寫中國人民在過去年代中所進行的艱苦、嚴酷的革命鬥爭的。它們不僅生動地描繪了紅軍指戰員、游擊隊員和地下工作者等堅毅、英勇的光輝形象，並且表現了他們對黨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和自我犧牲的崇高品質。還有兩篇描寫了革命先賢們近年來的生活片斷。這是一部輔助革命傳統教育的好作品。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084 字數99,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5 7/16 插頁4

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1969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30001—40,000冊

定價(3)0.44元

統一書號：10020·1084

定 价：0 . 4 4 元

目 次

媽 媽.....	1
赶 队.....	17
后 代.....	35
七根火柴.....	55
三人行.....	60
歌 声.....	66
村野的火星.....	79
亲 人.....	103
支队政委.....	120
普通劳动者.....	147
休 息.....	161
后 記.....	171

媽 媽

我們司的馮司長是個女同志。同志們當面叫她司長，背地里却都管她叫馮大姐。

其實，這個稱呼也並不恰當。她已經五十一歲了，比我母親還大兩歲呢，而且因為長年革命工作的勞累，她看去比實際年齡還老相些；她的頭髮雖是短剪着，却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白的了，臉頰有些瘦削，門牙也缺了一顆，使得上唇顯得略略有點癢。特別是當她挑起眼皮、透過近視眼鏡的上緣讀文件的時候，在她那光亮的上額上，就聚起幾條很深很深的皺紋。如果是個生人走進我們的辦公室，看着她這年紀和神態，誰會想到她就是領導我們這個重要機構的首長？說不定還會以為是誰的母親呢。

但是，我們把這位首長看得象母親，還不只是因為她的年紀，而是她的為人。比方說，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總是貪玩。晚上不是跳舞就是溜冰，再不就弄副撲克，一玩就是半宿；睡得遲起得也晚，來不及吃飯，就买个燒餅帶到辦公室里去啃啃。這事要讓她看見了，她就會走過來：“給我！”伸手拿過燒餅，墊上張紙，放在暖氣管子上烘着。等烘熱了，她再給倒上碗開水，一道送過來。這時，我們的燒餅是熱的，臉是熱的，連心也是熱的了。又比方，

我們这里很有几个球迷，一听到下班鈴响，撒腿就往球場里跑。这时，她又会一声叫住你，把你的衣服扣子扣好，把围巾給围上，說不定还把你掉出来的头髮給往帽舌底下塞塞。……

她就是这么个人。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她就这么体贴入微地照顧着我們。好象我們不是她的下屬，而是她亲生亲养的一群孩子。有时，我們也觉得她太有些婆婆媽媽，可要是她生病了或者是开会去了，不到办公室来，大家又会觉得象少了点什么，連那个最好說俏皮話逗乐子的老何也会一天沉着臉不吭气。

但是，尽管我們都怀着对母亲般的敬意爱着这位首长，有几件事却使我們感到奇怪：每天，上班的时候，她的秘書——那个姓孙的胖胖的姑娘給她送来公函、文件，她总是照例地翻拣一遍，然后問一句：“沒有？”秘書点点头，她就輕輕地叹口气，臉上頓時蒙上一层失望的、凄然的神色，人也更显得蒼老些。不过也有不問的时候，那时她手里一定有一封信，有时是机关来的，有时是私人来的。她就急急地看这信。看完了，又是照例地叹口气，把信塞进抽屜里。有时还离开坐位，走到窗前呆呆地站上一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怪脾气嗎？还是有什么心事？

我們得承認：关于馮司长的个人生活和她的历史，我們知道得是太少了。我只是在她剛来时的欢迎会上听过处长的介紹，知道她是个老黨員，党龄比我的年齡还长；

过去她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光坐牢的时间也不比我参加工作的时间短多少，具体的呢，就啥也不知道了。有时我們也想向她打听，可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她就說：“现在的新事还講不完呢，还翻那些老眼干什么？”我們只好悶在心里。

这个疑惑的事悶了好几个月，终于，得到了一个偶然的機會，解开了。

那是1954年春节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正站在司长办公桌前，接受下厂了解情况的任務。秘書送给她一张会客单。我瞟了一眼，会客单很平常。姓名：刘忆平，性别：男，年龄：二十六岁，职务：鞍鋼×厂的工程师；与被会人关系沒填，事由是看望。司长毫不在意地看了一遍，扔在桌上，接着又拿起来看了一遍，想了想，自言自語地說：“忆平……”突然，她一怔，驀地站起来，急乎乎地跑出去。我給弄得莫名其妙，随手从衣鈎上取下她的大衣，也跟着走出去。

在她推开会客室的門的时候，我赶上了她。只見会客室里一个戴皮帽子、穿灰呢大衣的青年，正在那里焦急地踱着步，見司长进去了，忙迎上来，但是，显然他們并不認識。那青年凝視了司长一会，說：“您是……”

“我是馮琪，”司长說着，臉上露出惊喜的神情，眼睛直盯着那人的臉，一步步向前靠近。随着司长的視綫，我看見，那人的額角上有一块小小的疤痕。

那青年嘴巴张了几张，再沒有說話，却从衣袋里掏出

一件东西来。我一看，是一只孩子戴的紅骨小手串。只見馮司长惊叫了一声：“平平！”张开两手扑上去；那人也叫了声“媽媽”，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当天，“馮司长的兒子来了”的消息，經過我的口飞快地传开来了。晚上，我們几个年輕人怀着兴奋和惊奇的心情，来到了司长的家里。看来，她們母子正在叙着离别之情，但奇怪的是：两个人都沒有說什么話，只見桌子上摆着一张紙，两人各拿一支鉛笔，在那里写着什么。馮司长大概也看出了我們的疑惑，一面把我們一一向她兒子介紹，一面笑着說：“他是在苏联长大的，本国話倒說不好。”这句话更引起了我們的兴趣，就七嘴八舌地問起来，那老何喳呼得更凶：“有故事，一定有故事！給我們講講吧！”

看来今天司长的兴致特別好，她点点头：“好，既然你們对这事有兴趣，就講給你們听。”她来到床边，坐到兒子身边說，“你也听听！”于是她就用我們那听慣了的、緩慢的声調，講起了关于她和孩子的故事。

“这孩子和小黄一样大，”她指着我說，“今年是二十六岁。我俩分开的那年他还不足六周岁。那是1933年。

“当时，我和他爸爸都在汕头做地下工作。后来他被調到江西紅区去，为了照顧孩子，也为了便于掩护工作，平平这孩子就留在我的身边。

“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給一个挑花工厂的老板作佣人，烧火做飯洗衣服。这个职业对于我的工作是很方便

的。利用早上买菜的时间，我可以开展活动或者与党的负责人接头，接受任务、彙报工作。但是我们娘儿俩的生活却很困难，因为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少，只要有公开职业，就不能拿党的钱用于个人生活。我的工钱呢，又少得可怜，每月刚够买米吃饭，有时还得匀出一点来，支援受难同志的家属。这样，虽然我给人家炒煮的是鲜鱼大肉，但我们自己却短不了饿肚子。有时看孩子苦得实在不行，就收拾人家一点残汤剩菜，给孩子吃。这些都还好说，最困难的还是寄人篱下的精神的折磨——这家人家也有个男孩子，比平平大一岁。这孩子每天放学回来的时间，就是平平受罪的时候，不是挨打，就是挨骂，不知吃过多少亏，受过多少委屈。

“当然，为了工作，这些只得忍着。孩子不懂，但我懂得，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人格，比他们高尚不知几万倍哪！”

“这天，我突然接受了一个任务：组织要我到城郊去接一个党从上海派来、经香港偷渡过来的同志。我好不容易借故向老板娘请了假，但是因为要走很多路，孩子不能带去。凑巧刚发了工钱，我买了几个烧饼留给孩子，就动身了。

“直到天黑，我才完成任务，赶回家来。一进房门，就看见孩子躺在床上，头破了，满头满脸都是血，正在抽抽噎噎地哭呢，见我来了，一头扑到我怀里，大哭起来，还不住声地哀求我：‘妈妈，走，咱们走吧！……’我一边给他包扎，一面问他。原来这又是房东孩子干的。那孩子放学

回家，見到平平在吃东西，伸手就搶，平平当然不讓。那孩子掏出硯台就打，竟把平平打成了这个样子。你們看！”她撫摸着忆平的額角。我又看到了那疤痕。我仿佛看見了当时的情景，看見了他那孩子的鮮血和屈辱的泪。

“当时，我自然又是难过又是气憤，可也沒法，刀把在人家手里攥着嘛。我只好安慰他：‘傻孩子，別說傻話了。走，走到哪里去？来，媽帶你外面玩玩去。’其实，也不是帶他玩，我还有任务：上級同志帶來的文件和一大笔錢在我身上，我必須很快把它交給党組織。为了避免出事，我把文件和錢包了个小包，捆到孩子身上，領着他先到一个藥房里上了点藥，就沿着大街往秘密机关住处走。

“因为生活困难，我怕孩子要这要那，从来不带孩子到大街上来。現在一到大街，孩子馬上被这熱鬧的城市夜景吸引住了，特別是走到一家兒童商店門口，他更是一步也不走了。他望望櫥窗里那些五顏六色的玩具和衣服，又望望我的臉，終于鼓起勇气說了句：‘媽媽，买！’

“‘孩子，不是給你說过，媽媽沒有錢哪！’我說。

“‘不，媽媽，你有錢，买！’他固執地扯着我的衣襟。

“噢，是了，他說的是我放在他身上帶的錢。可是，……我又不能給他明說；本想呵斥他几句，可看看他那滿纏綳帶的小臉，我的心又硬不起来。我不由得把手插进衣袋里，抓住了那刚发下来的一块多錢工錢；捏了一陣，还是空着把手拿出来，——那得吃飯呀！

“这时孩子又說了：‘媽媽，人家念書，我沒有，人

家……媽媽，你不是說你喜欢我嗎？……’說着，他眼珠一骨碌，一大滴眼淚流下來，滾過腮邊，滾過那破開幾個洞洞、油得發亮的衣襟上，一迸好遠，連挂都挂不住。我的感情不由得激動起來：來這裡半年多，孩子就是那件破衣服。一樣是孩子，老板家的孩子吃好穿好，有書讀，而我的孩子……好吧！我咬咬牙，一把把孩子抱起來，給他擦干了眼淚，走進店里，就着這些工錢，給孩子買了一件小褂，還買了兩塊點心。看看手里，還只剩三毛多錢了，去他的，一不做二不休，吃飯的事以後再說吧——給他們做了半年多的活，不相信連預支點工錢也不行。我又抱着孩子來到玩具櫃前。可是挑來揀去，不是不中意就是買不起，最後才看中了一副骨頭制的小手串，紅紅的，亮亮的，又好看又結實。我用了最後的這點錢，把它買了過來。

“我把衣服給孩子穿好，把手串戴在他那小手腕上，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點心，我的心里舒服極了。這種心情只有做母親的才能體會得到呀，對不對？”

我們被這個革命家的清貧的生活和她那母親的心所激動着，誰也沒有插話，都目不轉睛地望着她的臉，等着她繼續說下去。

“可是，”她說，“這件當時看來很順心的事，却叫我後悔了二十年。

“事情竟有那麼湊巧。就在我給孩子買東西的第二天清早，我在菜市場上和上級黨的同志接頭的時候，接到了

党的指示，决定要我到上海去，并且把一批文件和材料带到上海轉給中央。他交代了我到上海后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只是路費不湊手，他已派他爱人去取了，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兒去拿，由他那兒上船。

“接受了任务，我赶紧跑回家去，造了封假信，对老板說我母亲病重，要赶快回去。办妥了，我对平平說：‘孩子，你不是要走嗎，咱明天就离开这兒了。’他高兴得一蹦搂着我的脖子：‘媽媽，你真是个好媽媽！’

“誰想到在白区工作意外的事就那么多。当我兴冲冲地背着行李、領着孩子走到上級同志那里去时，却大吃一惊。他那向街的窗子上，窗帘低低地放下来了——这是暗号，告訴自己的同志：这里出事了。再試探着往前走了几步，看見两个警察抬着一大包东西从門里走出来，門前的台阶上，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正在喊爹叫娘地哭。我認得出，那正是这个同志的孩子。

“等警察走远了，我打发平平偷偷地跑上去把那个小女孩領过来，抱到怀里哄着。这时，我的心里象墜上了一块鉛：另找关系去吧？地下党是采取单线联系的；回老板家去借吧？不給人做工人家能白給錢；何况，現在又去不得。典当东西吧？我那个小行李卷做个身分掩护还可以，別說要卖，白給人家人家也不見得要。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那么感情用事，把錢全給孩子买了东西，弄得現在……我下意識地掏掏口袋，掏了一遍又一遍，錢沒掏着，手却触到了腰間的文件包。这使人更加焦急，沒有

錢，怎么上得去船，任务可怎么完成呵！

“沒法，我只得豁出臉皮闖一闖，想混上船去。誰知拖大帶小特別惹眼，人家一查票，不讓上不說，還叫臭罵了一頓。

“我躲在碼頭旁邊，一直等到天黑，也沒有瞅上个机会。船，‘嗚——’的一声开走了。

“我領着大的，抱着小的，沿着海边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孩子当然不知道我的心事，这个嚷：‘媽媽，餓……’那个叫：‘嬌嬌，吃……’也难怪他們，已是一天沒吃东西了。

“看看来到城郊，也沒个宿处，我沿路拣些香蕉皮、柚子壳、甘蔗梢头，来到一家大門楼底下坐下来，把半截甘蔗梢头給平平咬着，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嚼了，填到女孩的嘴里。慢慢地，孩子們睡着了。我怀里摟着孩子，手按着文件，听着孩子的鼾声和那震碎人心的海濤，一夜沒有合眼。

“天亮了，正想找个去处，大門开了，一位围着围裙的大嫂挎个竹籃走出来，一看就看得出是这家的佣人。她看見我們就問：‘你娘兒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只得依样撒个謊：‘母亲病重了，想去上海看看，沒上去船。’其实，我心里的焦急，就是媽媽真的病重也不能比呀。但話一出口，不由得心里一酸，流下泪来，这倒也真象了。

“看来这位大嫂是个善心人，她关心地問我：‘就不能

‘找个亲友帮衬帮衬？’

“沒有呵！”

“說話間，孩子醒了，又嚷着要吃。那大嫂嘆口气，进去端出来一大碗稀粥，給孩子們一人一口吃着。她又拿話安慰我。我从心里感激她，可两心隔肚皮，她哪晓得我的心事？我只需要錢，只要有那么一点錢就行呵。我說：

“大嫂，你的好心我知道，实不瞞你說，我缺的是盘纏呀！”

“这，这不好办。”她为难起来。但看来又不願讓我伤心。她看看我，又摸摸孩子，半天，忽然想起了什么，压低了声音問我：‘你还回来不？’

“回来？”我不懂她的意思，就含糊地答应：‘回来。’

“要是还回来，那倒有个办法，可是……不知該說不該說呀……”

“一听說有办法，我連忙抓住她：‘帮帮我，大嫂！’

“这……”我一催，她更迟疑起来了。

“我又催她：‘只要讓我們娘兒三个上得去船，怎么都行。’

“娘兒三个怕不行。大妹你别見怪，你不是两个孩子么，我是說你把一个孩子留給我东家做小的，你带上錢去上海。”她望了我一眼，一气說下去，‘以后，以后你多忙活点，有了錢，多化些錢还怕孩子贖不回来？’

“你們知道，潮汕地区去南洋的很多，劳动力少，有一

种风俗——兴买兒女。名义上是兒女，实际上是买劳动力。

“这个提議太意外了，我腦子‘嗡’的一声，啥話也說不出。那大嫂見我不吭声，叹口气，自言自語地說：‘唉，我說不該說呀，这倒成了拆散你們母子了……’說完，悄悄地提上籃子，走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两个孩子拉到怀里。孩子們一人一只手插进碗里，正在捞着最后的一点粥渣，这会都吃惊地望着我。我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女兒长得真俊秀，活象她媽媽；可是現在她爹媽正在法庭上受着酷刑，她大概已經見不到她的爹媽了。作为一个同志，为了死去的烈士們，我怎么也得想法把她带大。再看看平平，他头上的伤还没好，叫綳带衬着，显得眼睛更大，鼻梁兒也更高了。他那望人的神情，那吃东西的模样，多象他爸爸呀！我想起，他爸爸临走的时候，叫着我当时的名字：‘辛平，孩子留給你，受累是你一个人，幸福暂时也是你一个，可是想念他的却是我呀！’現在，我怎舍得把他扔給陌生的、又是財主家里去受罪呢？

“我想了又想：也許我去找个地方，做个十天半月的工，省吃俭用地积些錢？不行，時間不允許；也許我去沿門乞討？也不行，身上的文件呢？……实在沒法，我的思路又回到那大嫂剛才說的話上来。現在，就只有这条路能走了，可是，……我下不定决心。我还是想着，想着。忽然，‘吱——’的一声，汽笛又响了，这是上海来的船到

了。这时，仿佛这汽笛在用它那震人的大嗓门呵斥我：‘辛平呀辛平，你已经是入党五六年的共产党员了，怎么还这么糊涂？’那大嫂的话也在响：‘以后，多化些钱还怕赚不回来？’……

“唉！……”

“我正要下决心，那大嫂回来了。她从篮子底下摸出两个炸糕，递给孩子，对我说：‘妹妹，别伤心啦，这年头，穷人命苦，女人命更苦，……唉，另想想办法去吧……’”

“我再也不能犹豫了。我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大嫂，就，就照你说的办吧！’这话仿佛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的眼泪忽地涌了出来。”

“大嫂问：‘当真？’”

“‘当真！’我咬着牙，尽量把话说得肯定些。”

“‘那，是哪个呀？我领孩子进去看看。’”

“‘噢，’我紧咬着牙，抬手向平平一指。那手呀，足有千斤重。”

“那大嫂弯腰搀起平平的手：‘走，乖孩子，跟大媽去吃点东西去！’”

“约摸一个多钟头以后，大嫂领着孩子出来了，手里拿着三块银元，两张契纸。孩子，才隔了一个钟头，我觉得象隔了多少年。我没顾得接钱，又抱起了孩子。大嫂把钱交给我，还特地敲得铮铮地响。那敲的仿佛不是钱，而是我的心。”

“大嫂含着泪安慰我说：‘好妹妹，把心放宽点，只要